



【割出拼命求活的时间动手搜集材料】

◆与李剑华同时代的吴泽霖教授日后回忆：“尽管任何新兴学科总是时代需要的产物，但它在初建时并不都是一帆风顺，它不免会遭受责难、阻挠而被人摒弃或忽视。因此，需要创造条件培植它，推广它。”李剑华会同其他一些陆续留学归来的青年社会学者一起，在繁忙的授课之余抓紧点滴机会埋首写作。1928年，李剑华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劳动问题与劳动法》问世。

【心中只有民族忧患和国家兴亡】

◆李剑华明确断言：“我以为中国劳动问题，同时也是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不可不是劳动问题中的先决问题。”虽然身处当时那样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李剑华心中装的只有民族忧患和国家兴亡，所以他敢于仗义执言，公开申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李剑华后来也因此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龙华看守所，他依旧作诗，不放弃希望。后经党组织营救脱险。

【重返上海重建社会学】

◆1981年李剑华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任顾问，但他早年的社会学研究与社会活动经历让他放不下社会学。上世纪30年代，他曾经以地下党身份坚持革命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旧址就在现在徐汇区天平街道辖区内的永嘉路上，也因此怀念上海。这两重情感让他放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问身份，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

李剑华：推进中国社会学创建与复兴

■本报记者 陈韶旭

在我国老一代的社会学家里，李剑华教授可以说是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学者。他曾因主编《流火月刊》《现象月刊》等左翼进步刊物，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牢狱，身陷囹圄而坚贞不屈。他也曾衔命深入虎穴，打进国民党政府上层从事隐蔽战线的革命工作，以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和胆识，掩护革命战友，卫护工友兄弟，临危不惧，处险不惊，孤军奋战在敌人管束里直至迎来解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社会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而且始终与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发展和复兴相依、相联。

跋涉于艰难的中国社会学创建之路

社会学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是一门晚起的社会科学。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某些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仅有寥寥数本译著，“研习者甚少，而普通学者更不知社会学为何物”。辛亥革命以后，欧美的新思想、新文化陆续被介绍到国内来。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而且渐渐开始注重于西方的社会科学，而且渐渐开始注重于西方的社会科学。“五四”运动则在中国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追求进步、寻求真理、学习国外新思想、新学科的热潮。

1915年，青年学子李剑华在成都写下的《偶感》诗就说：“兵乱连连喜再生，居乡未必胜蓉城。哪堪夜静更闻后，又听邻家哭子声。”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深深刺激了李剑华，让他树立了学业报国的思想。他深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熏陶，中学毕业后，即在家人的支持下，东渡扶桑留学。在选择所学专业的时候，他看到“日本大学设有社会学，觉得名词新鲜”，当即就决定以这门新学科作为自己的研读方向。从此以后，李剑华便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5年上半年，李剑华学成回国，并先后担任上海法政大学、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国立劳动大学等多所院校的教授，讲授社会学史、劳动法以及犯罪社会学等课程。当时，中国社会学尚处于步履维艰的创建阶段，除了国外社会学译著的出版数量有所增加外，社会学还难以被人们接受和承认。诚如与李剑华同时代的吴泽霖教授日后所回忆的那样：“尽管任何新兴学科总是时代需要的产物，但它在初建时并不都是一帆风顺，它不免会遭受责难、阻挠而被人摒弃或忽视。因此，需要创造条件培植它，推广它。首先，学科本身除须具备一定的创见，经得起核实、考验或实践外，还要获得一定人数的拥护。其次，要有一定数量和不断的著述，既要出版书籍，也要出版定期刊物，借以扩大影响。再者，要设立机构，在同好中组织学会，交流思想；在学校里设置课程，建立学系，俾能承上启下，传播苗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剑华会同其他一些陆续留学归来的青年社会学者一起，在创建中国社会学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在繁忙的授课之余，他抓紧点滴机会，甚

打开社会学史迷宫的钥匙

李剑华在《社会学史纲》一书中，一扫以前那种照搬欧美学说，缺乏独立见解，“内容取材，往往不加选择，至为芜杂”的风气，运用自己丰富的学科知识，汲取国外学者的长处，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

“由百科全书的社会学到特殊社会科学的会学，由综合社会学到纯正社会学，这是社会学史上发展的途径。”这一精辟分析，可以说是一把打开社会学史迷宫的钥匙，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

【学术档案】

李剑华（1900—1993），社会学家、法学家，中共党员。四川省大邑县人。1921年赴日留学，在东京的日本大学进修社会学。1925年毕业回国后，历任上海学艺大学、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国立劳动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院等院校的社会学教授。1928年参与筹建“东南社会学会”。1930年被推选为“中国社会学社”编辑委员。1932年3月参加上海左翼社会科学界联盟。先后主编《流火月刊》（1931年）、《现象月刊》（1933年）。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副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上海第一医学院马列主义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劳动法教授、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主任。1981年起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兼管社会学所工作。1985年离休。1993年去世。主要著作有：《劳动问题与劳动法》《犯罪学》《社会学史纲》《监狱学》《犯罪社会学》等，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问题的中国社会学家之一。



杖朝之年扛起重建社会学的重担

由于历史原因，社会科学在1950年代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并不受到重视，李剑华的研究也并不受到重视。再加上受到一些冤案的牵连，李剑华不得不“靠边站”。但作为老地下工作者的严于律己的品质，让他并没有放弃对党的信赖和希望，服从工作分配，毫无怨言。

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春天。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这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社会学此后的命运。八十高龄的李剑华蒙受的冤案也得到彻底平反。“双喜临门”使李剑华重新恢复了学术青春。他全然不顾自己年老多病，毅然出任上海市社会学理事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负责人。在中国社会学百废待兴、“缺衣少食”之时，李剑华扛起了重建社会学的重担，开始了一场艰苦的社会学“创业”。

1980年1月2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翌年3月13日，李剑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兼管社会学所工作。其时，李剑华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任顾问，但他早年的社会学研究与社会活动经历让他放不下社会学。上世纪30年代，他曾经以地下党身份坚持革命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旧址就在现在徐汇区天平街道辖区内的永嘉路上，也因此怀念上海。这两重情感让他放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问身份，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

在人才方面，李剑华积极地从社会上招募早年毕业于社会学专业的大学生，以及各行各业的外语人才，并与中国社科院合招青年人才。他还延请了著名的老社会学家作为社会学的第一批特聘研究员，包括应成一、范定九、盲心哲几位先生。他们都是早年留学海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活跃于国内外社会学界的老前辈，彼时都已退休。这些老先生成为特聘研究员后，所里的后辈们得以常常请教，受益匪浅。

在科研方面，李剑华教授组织了科研人员翻译国外社会学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并组织编辑《社会学参考资料》，刊登国内外社会学的最新研究动态。更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李剑华与特聘研究员之一的范定九共同主编了《社会学简明辞典》，盲心哲等三十余人撰稿。李剑华作为主编，从条目框架到具体释文均亲自过问、逐条审阅，期间因用眼过度而使眼疾加重，眼底出血，他对此的用心尽力之深由此可见。全书约32万字，收录社会学常用术语和相关学科术语1086条，于198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本社会学专科学工具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为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献上了一份厚礼。

1989年，在上海社会学所建所十周年的庆祝会上，九十高龄的李剑华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学者提出希望：“社会学不应该是空洞的理论。”“对社会学要多加关照，因为这门学科现在的基础尚很薄弱，要给予扶持。社会学对党和政府的决策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大家要埋头苦干，做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和助手。”

（本文承蒙潘大渭、许妙发两位先生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会学会的响应和赞同，于是共同商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社”。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青年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李剑华教授被推选为《社会学刊》的编委。1947年，李剑华又在《社会学社》的第八周年纪念会上当选为候补监事。

剑胆琴心，做地下工作的同时坚持做学问

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李剑华投身于党的地下秘密工作。他和他的夫人胡绣枫都是充满传奇色彩，有些地下工作的经历，李剑华严守机密一直不对外吐露。胡绣枫的亲姐姐，便是打入敌伪76号特务机关大名鼎鼎的关露（原名胡寿菊）。

即使在那种与虎狼相伴的艰险岁月里，他仍然保持着一位学者的本色。1935年和1936年间，李剑华接连出版了《犯罪社会学》和《监狱学》两本著作。此时的李剑华不仅是位学者，更是一名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革命者，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越加娴熟，洞察社会现象的眼光越加敏锐，对当时社会层出不穷的犯罪问题，李剑华尖锐地指出：“我国因受封建制度底剥削，帝国主义底经济侵略，和天灾匪祸底压迫，以及世界经济恐慌与东北失地底影响等等，已经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国家。……‘大贫’往往是犯罪底发酵，从这一点讲来，可以说大贫不贫，犯罪不止。”“犯罪不是出于犯人之自由意志，而是因为社会本身的不健全，使其不得不陷入于犯罪的歧途。故不从社会本身去清算犯罪的一切原因，即使‘困围成市，犯罪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作者的锋芒所向，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反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监狱学》一书的写作出版，作者在‘自序’里一再强调：“我的目的，主要的不是为了向监狱当局提供如何管理犯人，如何镇压犯人，如何防止犯人脱逃的政策，而是为了引起大家对于监狱的关心，进一步要求监狱的彻底改良。”书中几乎每一个章节中都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苏联作为样板，进行对照评判，使读者能够十分清楚地了解到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对犯人实行的不同管理方法，以及产生的不同效果。作者的阶级意识和立场观点非常鲜明。

抗战胜利后，李剑华又以劳工问题专家的身份，出任上海社会局劳工处处长。当时，上海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而劳资纠纷层出不穷。他遵照

会学教科书，由孙本文发起，李剑华等一批有专长的年轻教授积极参与，各人承担一个专题，分工合作，撰写一套包括普通社会学各方面内容的丛书。《社会学史纲》即是该套丛书中的一本。由于参加丛书编写的执笔者“均系国内专攻社会科学之人，对于所任各书，尤擅专长，堪堪自信。”因而这套十五本之多的丛书至1931年全部出齐，并由孙本文将它汇编成《社会学大纲》。这本上下二册，计有90余万字的社会学巨著很快被列为大学部定用书，受到各大学教师和学生们的欢迎。李剑华在《社会学史纲》一书中，一扫以前那种照搬欧美学说，缺乏独立见解，“内容取材，往往不加选择，至为芜杂”的风气，运用自己丰富的学科知识，汲取国外学者的长处，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作者认为，从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学流派和学说，纵观八十多年来的社会学变迁和发展的过程，主要有两大思潮：甲、综合的社会学；乙、特殊社会科学的会学。综合社会学者，定要把社会学捧上社会科学的王座，却不知不觉间把社会学没落到哲学的鬼门关里去了。特殊社会科学的会学者，要把社会学从社会科学的王座上请下来，和各种社会科学分庭抗礼，……获得和各种社会科学同等的生存权。”作者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由百科全书的社会学到特殊社会科学的会学，由综合社会学到纯正社会学，这是社会学史上发展的途径。”李剑华的这一精辟分析，可以说是一把打开社会学史迷宫的钥匙，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

从1928年到1930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年轻的社会学教授李剑华先后出版了四部著作，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论文不计其数。李剑华的这些著述为荒芜的中国社会学园地栽下了一批清新茁壮的幼苗，为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失为中国社会学的创建人之一。

1928年9月，作为发起人之一，李剑华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地区性的学术研究团体——东南社会学会的筹备工作，并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李剑华几乎每期都给学会刊物撰稿。在《社会学刊》创刊号上，李剑华发表了《社会学在科学上的地位》的学术论文。紧接着在第二期上，又发表了《社会学体系论》和《孔德的生平及其学说》两篇文章。东南社会学会的成立，对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组织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929年冬，北京的一批社会学家许仕廉、陶孟和等人提议，在原有的东南社会学会的基础上扩大范围，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团体，获得东南社

者关系，及由这种不平等而产生社会的公正的事实。”难怪当时获悉此书即将出版的消息时，李剑华教授昔日留学东京时的同窗学友、日本社会学家浅野研真特地为此书作序：“李君在动乱未已的中国，从二十世纪国际的课题上，为指导新中国之有为之青年学者，他时而在学园讲授劳动问题，时而在世界讨论劳动立法，本其体验的见地，于今写成这样一部好著作。这一部著作，对于中国社会将予以很大的文化史的意义。”

让中国学生用上符合国情的教科书

当《劳动问题与劳动法》公开问世时，李剑华的另一部社会学专著《社会学史纲》业已杀青，准备付梓。1930年，该书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作者写作此书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社会学传入中国已经多年，然而这门新学科仍然处在被误解、遭排斥的境地，其原因在于一般人常常把“社会科学”“社会运动”“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等等名词和社会学等量齐观，混为一谈，从而使社会学成为“不明白的东西了。”李剑华为此深感痛心，决心要为社会学正本清源，匡正谬传。其二，当时社会学已经在一些大学里开课设系，但是所采用的教科书则无一例外都是欧美读本，学生对社会学教科书里的个案和理论产生很大困惑，就连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也忧心忡忡地指出：“班里有半以上的学生不是把美国的教材当作社会学论文，而是当作文学写作来阅读的。”为了让中国的学生能够用上符合本国国情的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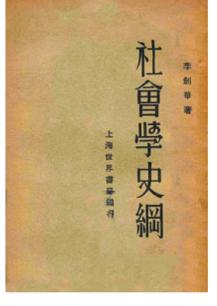
李剑华代表作一览



《劳动问题与劳动法》



《犯罪社会学》



《社会学史纲》